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王元鼎

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重大问题研究

RESEARCH ON IMPORTANT ISSUES IN CREATIVE
WRITING OF HISTORICALLY THEMED LITERATURE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丁国
题

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重大问题研究

RESEARCH ON IMPORTANT ISSUES IN CREATIVE
WRITING OF HISTORICALLY THEMED LITERATURE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重大问题研究/童庆炳等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8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ISBN 978 - 7 - 5141 - 0972 - 6

I. ①历… II. ①童…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 -
文学创作 - 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2534 号

责任编辑: 程晓云 张庆杰

责任校对: 徐领柱

版式设计: 齐 杰

技术编辑: 邱 天

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重大问题研究

童庆炳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箱: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 × 1092 16 开 36.75 印张 700000 字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0972 - 6 定价: 9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课题组主要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起林

刘洪涛

邹 红

沈庆利

李春青

李真瑜

吴秀明

郭英德

程正民

童庆炳

编审委员会成员

主 任	孔和平	罗志荣			
委 员	郭兆旭	吕 萍	唐俊南	安 远	
	文远怀	张 虹	谢 锐	解 丹	

总 序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熏陶和滋养；一个国家要在国际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优势，不能没有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软实力”的强大和支撑。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五个高度重视”、“两个不可替代”等重要思想论断。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哲学社会科学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新世纪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阶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和任务，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保障和强大动力。

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双百”方针，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理论创新为主导，以方法创新为突破口，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立足创新、提高质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呈现空前繁荣的发展局面。广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推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理论创新，服务党和国家的政策决策，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自2003年始，教育部正式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计划。这是教育部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教育部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重大攻关项目采取招投标的组织方式，按照“公平竞争，择优立项，严格管理，铸造精品”的要求进行，每年评审立项约40个项目，每个项目资助30万~80万元。项目研究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鼓励跨学科、跨学校、跨地区的联合研究，鼓励吸收国内外专家共同参加课题组研究工作。几年来，重大攻关项目以解决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以提升为党和政府咨询决策服务能力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为战略目标，集合高校优秀研究团队和顶尖人才，团结协作，联合攻关，产出了一批标志性研究成果，壮大了科研人才队伍，有效提升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实力。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为此作出重要批示，指出重大攻关项目有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影响广泛，成效显著；要总结经验，再接再厉，紧密服务国家需求，更好地优化资源，突出重点，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这个重要批示，既充分肯定了重大攻关项目取得的优异成绩，又对重大攻关项目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和殷切希望。

服务学术创新的理念，坚持科学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切实增强服务意识，不断创新管理模式，健全管理制度，加强对重大攻关项目从选题遴选、评审立项、组织开题、中期检查到最终成果鉴定的全过程管理，逐渐探索并形成一套成熟的、符合学术研究规律的管理办法，努力将重大攻关项目打造成学术精品工程。我们将项目最终成果汇编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文库”统一组织出版。经济科学出版社倾全社之力，精心组织编辑力量，努力铸造出版精品。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欣然题词：“经时济世 继往开来——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成果出版”；欧阳中石先生手书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书名，充分体现了他们对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切勉励和由衷期望。

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之魂，是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断深化的不竭动力。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历史的呼唤，时代的强音，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迫切要求。我们要不断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立足新实践，适应新要求，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为己任，振奋精神，开拓进取，以改革创新精神，大力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贡献更大的力量。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前言

新时期以来，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进入一个繁荣时期。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作品数量之多，出版之众，印刷量之大，读者之多，影响之大，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空前的。从姚雪垠的反映明末的农民起义的长篇历史小说的《李自成》开始，随后较有代表性的长篇历史小说有凌力的《少年天子》、《暮鼓晨钟——少年康熙》、《梦断关河》，徐兴业的《金瓯缺》，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杨度》，熊召政的《张居正》，卧龙的《汉武帝》，王梓夫的《漕运码头》，包丽英的《蒙古帝国》，颜廷瑞的《汴京风骚》，高旅的《玉叶冠》；周国汉的《张骞大使》，王鼎三的《洛阳风云》，万斌生的《王安石》，映全的《楚王》，丁牧的《中原乱》，高光的《孔子》，常万生的《唐太宗》，马昭的《草堂春秋》，孙浩辉的《大秦帝国》，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项羽与刘邦》，法国作家勒内·格鲁塞的《成吉思汗》，等等。此外，红色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也涌现出众多作品，在网络上发表还未出版的历史小说也还有很多。这些面世的长篇历史小说经过电影或电视连续剧的改编、播放，读者数量又大大增加，影响也就更大。这些历史题材小说的涌现，丰富了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有部分作品也有一定的思想力量和艺术水平，产生了好的社会效果，满足了群众的艺术欣赏要求。对于新时期历史题材文学所取得的成绩应充分肯定并作出公允的评价。但不能不看到，由于中国人的历史癖好，喜欢阅读历史题材的小说很多，这些作品销路很好，出版商获利巨大，于是历史题材

文学被商业化所裹挟，粗制滥造的作品也不少，所产生的问题也很多，这就给文艺理论工作者提出一个任务，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当代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

2004年，我们课题组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竞标中获得了“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和改编中重大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04JZD0035）这个课题，从2005年开始，我们潜心于整个课题的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于2009年春天到来的时候，终于完成了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发表论文50篇，最终成果50万字，重点研究了十大问题和八大现象，对于古代、现代和外国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体验也做了粗略的总结。

我们的最终成果回答了十大问题，解析了八大现象，把历史题材创作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这篇“序言”，则试图从五个向度来厘清历史题材文学中的主要问题。

一、历史文学创作的历史观问题

创作历史题材文学作品，首先遇到的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根据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某个历史时期、某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作出怎样的是非判断，或歌颂或批判等。当然，我们是要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看待、评价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什么？美国学者杰姆逊曾说过，马克思写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那页书（在英文书中），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一页书。马克思这篇论文的中文译本则在上下两页中。所以我们可以说，因为正是在这两页书里，马克思鲜明地提出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核心点：第一是“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第二是指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那么革命的时代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的冲突。这种冲突的解决首先是经济基础

的变更，其次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变更，其中也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变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着眼的是解决社会冲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才可能改善。一切历史时代的人物，是否对历史的进步作出贡献，也要从他们是否解决了阻碍社会发展的社会冲突中所起的作用来加以判断。^①

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著有《万历十五年》等著作，他提出了一种“大历史观”。他的《万历十五年》成为新时期学者阅读中的一个事件，他的观点的确给予我们许多启发。按照我的理解，他的“大历史观”有三点相互联系的内容：第一是从技术理性的角度看历史。他说：“大历史观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至于将道德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② 他的文字，猛一读比较费解。“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阅读他的全部著作，我们才会有所了解，他的意思是从数字可以统计的角度来看历史。如在欧洲，为什么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商业的品格，一切都是可以用数字统计技术计算出来的，当然也是可以用统计数字的技术来管理的。这种具有商业化的可用数字技术来统计和管理的社会，必然会创造大量的财富，生产力也就大发展了。他的“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归结起来就是认为社会的统治者不要过多地用道德笼罩一切，譬如不要总是把人分成“君子小人”之类，分成“白猫黑猫”之类，而是要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而这生产力的发展是要在重视数字统计和数字管理的条件下才可以达到。所以，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了两三千年，最接近资本主义的时期，是宋代。宋代的商业发展是空前的。特别是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有可能改变长期维持道德统治的中国。因为变法加速金融经济，使财政商业化。从而可以“不加税而国用足”（王安石）。新法的主要措施如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等都是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②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5页。

图以可计算的信用贷款、资金融通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生产大量增加，货物大流通，国家就可以从高额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王安石的全面变法，就是试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管理国事。这种办法如能成功，“纵使政府不立即成为一个大公司，也有大公司的业务”^①，那么，中国将进入一种数目字技术管理的时代，财富的大量积累，必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会同时到来，如果历史走向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将重新改写。第二是用这种大历史观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不能孤立地在某个划定的短时段来看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要从历史发展的长过程的大潮流中来看历史人物是非功过。黄仁宇说：“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②又说：“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一百零一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九十九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③“大历史观”侧重于对历史的动态观察和纵向研究，提倡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审察和批判历史。因为只有通过长时间、远距离和宽视界，我们才能看清社会冲突是否真正地解决。换言之，任何社会都有一个萌芽和新兴时期，也有一个衰落和灭亡时期，从而形成不同社会历史潮流。那么，我们如何来评价历史人物在历史社会潮流中的功过呢？这就要看他所领导的社会变革是顺应或推进历史潮流，解决了社会的现存冲突呢，还是根本没有解决社会的现存冲突，甚至阻碍和阻挡社会历史潮流的发展。第三是大历史观要求我们看一个小的历史人物或小历史事件，一般也不应就事论事，而应该当看这小人物和小事件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置放于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考察。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当然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阶级压迫和剥削，而黄仁宇则关注技术

①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5页。

②③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6页。

理性的改进并促进商业化，这一点我们不可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相混淆。但我们又要看到马克思还是黄仁宇都认为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只有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至于从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审察和批判历史，马克思和黄仁宇都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要清楚地分出社会发展的新兴期和没落期，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了什么不同的角色，都要纳入到这个社会发展过程的不同时期去考察和评价。所以我们又要看到历史唯物主义和大历史观也有一致的地方。我们今天在创作或评论历史题材文学的时候，当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但黄仁宇与马克思相一致的观点似乎也可以作为参考。

根据这样的历史观，我们来看一看创作历史长篇小说《大秦帝国》的孙浩晖和创作“落霞三部曲”即清代康、雍、乾三皇帝的小说的二月河的一段对话。二月河在对话中说：“整个历史就是一个抛物线，秦王朝可以看到抛物线刚刚上抛的时候，产生激烈的、灿烂的火花。到了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是抛物线开始下落了。下落也是美丽的。下落也是给人一种流星的灿烂的曲线美。凄美和壮美，都给心灵上的一些碰撞。至于说秦王朝和清王朝它们有共同的地方，但是区别也是有很多的。下落的时候有下落的特点，上升有爆发的原因和特点。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讲座对于总结和研究这个过程，当然我这个书是小说，我不希望别人把这个书当做历史来读，在座的同学如果对秦王朝的崛起和清王朝的下落感兴趣，你自己可以去研究历史，你会有自己的心得。你会发表出更高的见解，我们写小说是给所有人看的，也不指小批量的专业爱好者，是指所有的人，想通过这些东西给人一些历史上的启迪，让人感受到很多的历史氛围和人文感受。”^① 二月河的“抛物线”的比喻很好。秦王朝是抛物线的上升的时期，清王朝则是抛物线下落的时期。但二月河认为，不论是抛物线的哪一头都有“共同点”，都有美处，一个是“激烈的灿烂的火花”，是“壮美”；

^① 见 book.sina.com.cn/author/subje/2008-04-2... 2010-12-31。

另一个是“流行的灿烂的曲线美”，是“凄美”。联系到二月河的“康雍乾盛世”的三部小说，他的说法是难以令人接受的，或者说，他的说法在历史观上是错误的。

秦始皇处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新兴时期^①，那时的中华文明如初升的太阳，喷薄而出，光辉灿烂，前途似锦。中华民族文化有诸多特点，在秦统一中国前后已逐渐形成。如：战国时期的人民不希望各君主国混战，希望中国走向统一，统一的意向始终成为人民的一种理想；那个时代农耕文明已奠定了基础，使中国人有可能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以儒家为主的人文传统使中国人认识到人之为人乃“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具有尊严的，人是“三才”之一；儒家人伦中心主义，使世代代人生活于具有人性生活秩序中；儒家的尊君爱民传统，是人与人之间处于有等级的又是有亲切关怀的气氛中；儒家的中庸协和精神使中国人热爱和平，与人和平相处，与自然和平相处；儒家为主的延绵坚韧精神，使中国人民继承世代传统，使中国人以勤劳、刻苦和勇敢著称于世。秦始皇所继承的中华文明是夏商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精神的融合和总结。在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起步之时，中华文化的这些元素和特点都是勃勃而有生机的，应该加以肯定的。孙浩晖的《大秦帝国》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抛物线”刚刚划出的时期，充分肯定与赞美了中华文明的光辉，特别是适度地赞美了秦始皇。

统一中国，消除了长达三百年的战国纷争，解除了人民因战乱带来的苦难。这从历史的长时段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当然，秦始皇有秦始皇的问题，后文还要论及。

但清代的康、雍、乾三朝，已处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末世，如果说，秦代是八九点钟的太阳的话，那么清代已经到了日薄西山黄昏时刻了，历史的情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有作为的统治者，就应该顺应历史的潮流，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作出调整和变革，在历史提供的条件下，打破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以满足人民的新的要求、

^① 这里不使用“封建社会”这个词语。因为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或哪几个朝代是封建社会，至今历史学界仍争论不休。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只有“夏商周”三朝属于封建社会。又如有的学者认为封建社会是从魏晋时期才开始的。我们这里用“中国传统社会”是指从春秋到晚清数千年的历史时期。

需要和愿望。但是他们却没有任何变革的愿望和要求，反而大搞文字狱，钳制士人的言论自由；大搞禁海，完全闭关锁国；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但不应该歌颂他们的统治是盛世，而且要揭示他们的统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灭亡前的回光返照，要展现现代社会的曙光。但是二月河的三部描写康熙、雍正和乾隆的小说，还是把康雍乾三朝看成“盛世”，甚至用浓墨重彩地歌颂了他们的英明的作为、处事的果敢、统治的仁爱等，描写所谓的“流行的灿烂的曲线美”和“凄美”。对于“盛世”的理解，不能把某个朝代孤立起来理解，而要看它处于社会发展的那个阶段、那个时段，历史的潮流已经提出了什么要求，所谓“抛物线”的两端，是完全不同的，不能相提并论。而且这里所说的“凄美”，似乎应带有悲剧的意味，但二月河的笔下那些帝王有谁带有悲剧意味呢？二月河一味鼓吹康雍乾“盛世”，是颠倒了历史的是非，他的历史观连生活于18世纪的曹雪芹都不如，曹雪芹还能预感和揭示清朝的统治表面上像“烈火喷油”之盛，实际上“内囊已尽上来了”，最终是要“树倒猢猻散”，“落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而二月河最初也是研究《红楼梦》的，却不但不能效法曹雪芹，反跟曹雪芹对着干，歌颂起“落霞”的“凄美”来了，这是让人不能理解的。

历史观不能不是创作历史题材文学的首先要关注的第一个大问题，因为不管怎么说，你是在写“历史”，你不能不对你写的那段历史有一理解和评判，你不可能同情或赞美这个人 and 事，不可能不贬抑或批判那个人和事。你在历史叙述中无法做到纯客观，你的主观情感不能不渗透到你的历史叙述中去。“观点”是很重要的，我们感觉和理解世界上的事物，都取决于一个特定的“观点”。清代“康雍乾”三朝历史如果我们换一个观点来看，就和二月河看到的不一样。就如一个人从飞机上俯视一座一百层的高楼，觉得那不过是一个火柴盒，而从平地上仰视它，觉得它巍然耸立，拔地而起，那感觉和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曹雪芹站在历史的高处来看康雍乾及其走势，觉得那已经快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二月河则从一个低洼地来仰视康雍乾，所以觉得其“巍然耸立”，也就不奇怪了。

二、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历史真实问题

历史真实是一切创作历史题材文学的作家的重要追求。除了那些有意“戏说”的作品除外，一般的以历史题材为创作的作家，都宣称自己的作品达到了“历史真实”。但是什么是“历史真实”呢？历史题材文学作品能达到历史真实吗？这个问题在中国争论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仍然没有得出大家都一致同意的结论。

对于历史与文学哪个更高？历史上是有分歧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大体上可以说，文学“战胜”了历史。亚里斯多德在《诗学》对此说得很清楚：“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①但是，到了19世纪，由于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发展，认为历史是纯客观的真实，更具有价值；文学则是虚构的，虚构只是一种“可能”，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历史比文学更具有价值。然而，亚里斯多德的见解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的。所以，我们第一步要把“历史”这个概念弄清楚。

“历史”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从词源上说，甲骨文中的“史”与“事”相似，“史”乃是指事件。许慎《说文解字》写道：“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这里的“记事者”，根据中国古代的惯例，显然是指“史官”。问题是“史官”记录的事件就一定“中”或“正”吗？这当然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有董狐、太史伯那样“据事直书”的史官，也有更多按照统治者的要求或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去书写历史的史官。前者的记录可能保存了事件的真相，而后者则可能是按照当时统治者的要求或个人的观点带有某些想象和虚构了。就是说，历史可能是客观的，也可能是主观的，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想象的。两种情况都存在过。西方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在西方，多数语言的“历史”一词源出自希腊语“historia”。根据有的学者的研究和说法，认为“历史既是过去发生过的事件，又是叙述过去这些

事件的故事，在法文里，histoire 这个字就既有‘历史’、又有‘故事’这两种含义，由此可见，真实与想象之间、现实与虚构之间，从来就有一种紧张而又密切的关系。在西方传统的早期，希罗多德和修昔底斯的历史著作提供了历史叙述的两种不同的模式。”^①我之所以要引用这段话，是因为作者用了“紧张而又密切”这个有趣的表述，意思是说本来历史是应该真实的，但我们看到的历史叙述又往往是想象的，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关系不是很“紧张”吗？但是又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说我们面对的历史叙述常常是真实中有想象，想象中有真实，真实与想象交织在一起。

西方 19 世纪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个巅峰的时代，人们也相信科学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其中也包括能解决历史叙述中的真实问题。这就出现了科学主义的历史真实观。这种科学主义的历史真实观以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为代表。兰克被称为“近代史学之父”、“科学历史之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一生著作甚丰。他的最早的著作是 1824 年出版的《拉丁与条顿民族史（1492～1535）》，1834～1836 年间撰写了《16、17 世纪的罗马教皇及其教会与国家》，即《教皇史》，1839～1847 年，他用了八年时间撰写了《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1847～1848 年间写了《普鲁士史九书》，1852～1861 年撰写了《16、17 世纪法国史》，1859～1868 年又用了近 9 年时间撰写了《16、17 世纪英国史》，1869 年撰写了《华伦斯坦传》，1871 年写了《德意志诸邦国和诸侯同盟：德意志史（1780～1790）》，1881～1888 年撰写 16 卷的《世界史》，可惜没有全部完成。他的全集有 54 卷之多。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学派。兰克的历史真实观，就是他的那句不断被人引用的话：历史学家只是“表明过去是怎样的”。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一书前言中的话。^②他还有一句名言：“我情愿忘却自我而只讲述能够彰显强势人物的事情”。这句话出自他的《英国史》第二卷。这两句话有丰富的内涵，

① 张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6 页。

② 参见兰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中译本“编者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 页。